

汉语跨类集合表量构式的认知动因与哲学诱因

仇伟

(济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 范畴的动态性一直以来都备受学者们关注,集合量词的动态发展是词类范畴动态性的根本体现,但是先前研究对集合表量构式的跨类交融关注较少。汉语中存在跨类交融的集合表量构式,主要有四种类型:“集合/个体”交融型、“集合/度量”交融型、“集合/临时”交融型及多重交融型。本文从认知语言学与中国哲学的双翼探究跨类集合表量构式浮现的根源。研究发现,首先,语用推理、认知经济和视角调整是促发这一构式跨类交融的认知动因;其次,中国哲学的主体思维和辩证思维是这一构式跨类的哲学诱因。本研究为揭示汉语表量范畴的动态机制及人类的认知思维提供了新的启示。

关键词: 集合表量构式;跨类;动因;认知;哲学

中图分类号: H13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5)05-0028-14

0 引言

汉语存在跨类交融的集合表量构式“数词 + 量词_{集合/个体/度量/临时等} + X”,其中X以名词为主,间或为形容词等。学界早已注意到跨类表量结构的存在。魏兆惠等(2008)发现“通”具有度量名词、名量词和动量词的交叉功能。高亚楠等(2014)提出了“跨类量词”的概念,李小军(2016)和冯赫(2018)等发掘了特定的跨类量词,但多囿于个别跨类量词。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探索集合量词的跨类,聚焦于体认机制(廖巧云等,2023)、英汉对比(李鑫颖等,2021)、历史成因(高亚楠等,2018;王绍新,2018)、语言类型特征(李计伟,2017)等。

整体言之,学界对汉语跨类集合量词的研究较少,尚未就集合表量构式跨类交融的认知动因和哲学机制进行深入探解。鉴于此,在对跨类集合量词进行分类和描写的基础上,本文旨在叩问集合表量构式的演变路径,探问其跨类浮现的认知动因和哲学缘由,以便更好管窥表量系统的全貌,实现语法研究历史和哲学的有机统一。

1 跨类集合量词的分布类型

概而言之,汉语量词可分为两大类:名量词和动量词。名量词可细分为个体量词、集合

收稿日期:2025-02-23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一般项目“英汉集合表量构式历时认知对比研究”(23CYYJ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仇伟,男,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和英汉语言对比研究。

引用格式:仇伟. 汉语跨类集合表量构式的认知动因与哲学诱因[J]. 外国语文,2025(5):28-41.

量词、度量量词、临时量词、容器量词等。依此子类,我们将跨类的集合量词确定为四种主要类型:“集合/个体”交融型、“集合/度量”交融型、“集合/临时”交融型及多重交融型。下文我们将分而述之。

1.1 “集合/个体”交融型量词

“集合/个体”交融型量词横跨个体量词、集合量词两个次类,常见的有“片、辈、叠、挂、窠、具、铺、束、摊、团”等。我们以“片”为例进行诠释。“片”的本义是“木片”。《广雅·释诂》谓:“片,半也。”许慎《说文解字》曰:“片,判木也。”段玉裁注:“谓一分为二之木。”判木即剖开的树木,进而指其他扁而薄的物体。“片”最初是个体量词,用来称量薄而小的成片的东西(刘世儒,1965:120),而后“片”词义扩展,只取其片面的片形,而与薄而小无关。

(1) 慈门数片叶,道树一林花。(南北朝·何处士《春日从将军游山寺》)(刘世儒,1965:120)

(2) 天忽有一片五色云。(隋·王劭《舍利感应记别录》)(刘世儒,1965:121)

“片”发展的一个方向是“连缀成片”,演变为泛表“多夥”的用法。这也就是集合量词的用法,用于计量较大范围、汇集在一起的景象或事物,如例(3)所示:

(3) a. 涧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南北朝·庾信《游山诗》)(刘世儒,1965:121)

b. 这一片田地,好个卓庵。(五代·静·筠《祖堂集》)(王绍新,2018:380)

c. 看得我也好想让我的颜龄秒杀身边一大片女人!!!(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①

正因“片”兼具集合和个体量词之属性,有时其具体特性需参酌上下文进行语用推理(刘世儒,1965:121):

(4) 河边一片石,不复肯支机。(南北朝·庾信《见征客始还遇猎诗》)

例(4)中的“一片石”指的是一块石头,还是很大块的石头?孤立地看,皆有可能。若结合下文的“支机”,基本可确定是个体量词。由此可见,在表量结构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应密切关注言者和听者在协商情境意义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金华方言中的“片”既是个体量词,用于称量成片的东西(一片肉),也是集合量词,用于计量一大片的植物等(一片树)(李荣,1996:85)。不仅如此,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量词同样展现了集合量词和个体量词的交融,如毕苏语的反响型量词“棵”[tsuŋ⁵⁵]是个体量词,除了计量来源名词“树”之外,还可称量性质相似的事物,相当于集合量词“捆”“把”,如“一把草”[mo³¹ka³¹thi³¹tsuŋ⁵⁵](蒋颖,2009:81)。

1.2 “集合/度量”交融型量词

“集合/度量”交融型量词指度量量词同集合量词相通的跨类量词,包括“担、掬、抱、挑”等。这类量词以动作、容器或承载物容纳的量为计量单位,表事物容积、重量。我们以

① 网址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

“担”为例进行阐述。《字林》：“担，负也。”本义是用肩挑，引申为名词“肩挑之物”，如（王绍新，2018:571）：

(5)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汉·佚名《陌上桑》）

量词“担”的用法有二：一为标准量词，是市制重量单位，一担等于一百斤。李贤注引《汉书音义》：“齐人名小罍为担，今江淮人谓一石为一担。”另一个用法为集合量词，表述所挑之物，如例（6）：

(6)a. 蒸饼千盘万担，一时云集宕泉。（黄征、吴伟校注《敦煌愿文集》）（王绍新，2018:571）

b. 悄悄的备了一篓炭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无独有偶，侗语中也存在借用器物来充任集合量词的，如“一担柴”[ʔi⁵⁵ tap³²³ tət⁵⁵]中的“担”[tap³²³]（龙耀宏，2003:87）。壮侗语族的集合量词“担”还是跨语支同源的：壮[ɣa:p⁷]、布依[za:p⁷]、临高[]hap⁷]、傣西[hap⁹]、傣德[ha:p⁹]、侗[ta:p⁹]、仡佬[kɣa:p⁷]、水[ta:p⁷]和毛南[ta:p⁷]（蒋颖，2009:131）。

除标准量词之外，“集合/度量”交融型量词还囊括了诉诸肢体计量事物的非标准量词，如例（7）中的“一掬”（刘世儒，1965:243）：

(7) 即以一掬土施佛。（晋·法显《佛国记》）

许慎《说文解字》云：“在手曰掬。”段玉裁注：“会意。米至散，两手兜之而聚。（谓之掬）俗作掬。”“掬”本义指用两手捧，例（7）的“掬”用作集合量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捧”，是把“土”掬起来。正因此，刘世儒（1965:247）谓之处置称量法。

简而言之，由度量量词向集合量词的转换反复出现，逐渐固化，集合表量结构通过经验确立了下来。

1.3 “集合/临时”交融型量词

“集合/临时”交融型量词横跨临时量词和集合量词两个次类。本节以“房”为例进行阐述。许慎《说文解字》曰：“房，室在旁也。”“房”在古代指正室两旁的房间，如“孟孙立于房外”（春秋·左丘明《左传·定公六年》）。后来泛指住人或放东西的房屋，如“山房霜气晴，一宿遂平生”（唐·温庭筠《宿白盖峰寺寄僧》）。“房”引申为形状或用途像房的东西，如箭筒：“每射，抽矢，戢，纳诸厨子之房”（春秋·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

隋唐五代时期，“房”引导的表量结构成熟，具有多种功能，主要充任集合量词，如计量家族的分支或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或者箭（王绍新，2018:429-430）：

(8)a. 赐物五千段、细马二十匹、奴婢十房（后晋·刘昫等《旧唐书》）

b. 高祖少神勇……又龙门战，尽一房箭，中八十人。（唐·段成式《酉阳杂俎》）

同时,“房”还可充任临时量词(王绍新,2018:430):

(9)蕙带缠腰复野蔬,一庄水竹数房书。(唐·姚合《过友人山庄》)

与此相仿,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基诺语中,“房子”[tso⁴²]是个临时的物量词(盖兴之,1986:43)。现在,“房”引导的集合表量构式较为常见(郭先珍,2002:44):

(10)这一房红木家具是准备二儿子结婚用的。

在藏缅语族白语中,与“房”意思相仿的“院”同样是集合量词(徐琳等,1984:28)。由此可见,由临时量词或集合量词组成的表量结构编码反复进行,就会发生固化,到一定程度后则会常规化,成为语言单位。

1.4 多重交融型量词

集合量词的多重交融指量词横跨个体、集合、动量、临时、度量等次类的三种及以上。我们可借助“把”进行阐述。许慎《说文解字》云:“把,握也。”“把”的本义是抓住或持握。“把”具有集合量词、个体量词和动量词三个形式。在这些用法中,集合量词“把”最早出现。一个动词能够同时发展出三个量词的用法,这一现象对于把握汉语集合量词跨类的产生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把”由动词义引申为一手所握的粗细或多少,是一种非标准的计量词,如例(11)中的“拱把”指一两把粗(王绍新,2018:289):

(11)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战国《孟子·告子上》)

集合量词“把”最早见于西汉,中古继续存在,有很强的生命力,一直沿用至今。集合量词“把”对一手所握物进行计量,初期称量同类固体实物的集合,如(王绍新,2018:289):

(12)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飞不为高下。(西汉·刘向《新序》)

降至魏晋南北朝,“把”的度量兼集合的用法已很普遍,如(王绍新,2018:289):

(13)米裹着蒿叶一把,白盐一把。(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

从汉至南北朝,再至隋唐五代,“把”的词汇义很强,表一手所握之量,表量对象主要包括固态实物、液态实物或情感类非实物,一直是个跨越集合和非标准计量的词语,如:

(14)a. 或蒸一升麻,或爍两把菊。(唐·皮日休《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李建平,2016:109)

b. 如今一把伤心泪,犹恨江南过此生。(宋·佚名《鹧鸪天·真个亲曾见太平》)(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个体量词“把”的出现晚于集合量词的用法,最初主要称量带柄物(如斧、刀等)。至元代,其表量对象新增了椅子等事物。这类事物虽无把手,但仍有一关键部位可被手把控。“把”发挥个体量词的功能,表量对象从有柄物到无柄物,再到抽象物,如:

(15)a. 手里拿一把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明·施耐庵《水浒传》)(北京大学 CCL 语

料库)

b. 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清·曹雪芹、高鄂《红楼梦》)(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动量词“把”用于计量与手相关的动作,始于宋代,至元明,动量词“把”的使用次数有所增加。如:

(16)沙僧措手不及,被怪一把抓住,捉进洞去。(明·吴承恩《西游记》)(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苗瑶语存在跨语支同源的个体量词,如“一把刀”中的“把”:养蒿苗语[tɕaŋ^1]、湾水苗语[tɕe^1]、鱼粮苗语[tɕu^1]、湘西苗语[tei^1]、布努[tɕŋ^1]和勉[tsuŋ^1]。苗瑶语还存在同一语支同源的集合量词,如“一把米”中的“把”:湘西苗语[cu^7]、川黔滇苗语[tɕu^7]和布努[tyu^7](蒋颖,2009:135)。

由此观之,不同类型的量词可跨类,作为一种认知常规在说话者的大脑中建立起来,并会固化为约定俗成的表量结构。早期量词(如个体量词、度量量词、临时量词等)在历时演变过程中都可能发展为集合量词,就此而言集合量词类似于“组合锚”(syntagmatic anchor)(Schmid,2020)。这类嬗变常会关乎一个中间阶段,在此阶段两种甚至是多种量词共存。此外,集合量词还会嬗变为个体量词。至于这类转变的认知动因,则是下一节要探索的主题。

2 跨类集合表量构式的认知动因

语言演变存在于语言使用过程之中(Bybee,2010:11-12),因此语言演变的动因要从人类信息交流活动和语言使用过程中去发掘。本文所指的动因是以认知为基石的,也指交际语用动因,包括以某种独特或引人瞩目的方式来展示言者自己。集合表量构式跨类交融是通过有动因的规约来实现的,这里的动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语用推理、认知经济和视角调整。

2.1 语用推理

语言类型学认为“语言使用的性质决定语言系统的性质”(Croft,2003:287)。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使用塑造语言结构,推理是人的基本认知能力(大堀寿夫,2023:12),而构式的样例(exemplar)会影响认知表征(Bybee,2010:28)。表量构式以现有表量构式的具体样例为基础孳孕新的表量构式,这就造成了集合表量构式的跨类。换言之,现存表量构式产出的具体样例,在语境中使用,会展现新的语用含义或结构形式,由此孳生新的集合表量构式。

我们认为,当某种蕴涵义经常伴随某一语言结构时,语义演变会随之发生。语义演变

会造成形式与其最初意义的错配。听者有时不会明确知晓言者意欲传递的信息,而言者很可能想让听者考虑语言结构所传递的不同意义。这种现象就是邀约推理(invited inference)(Traugott, 1989),抑或是统称为语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ing)。

语用推理强调言者和听者之间的意义协商,言者“约请”理解,听者进行有效推理。在集合表量结构的发展历程中,语境会赋予表量构式以意义,在意义赋予的过程中听者的语用推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来自语境的、本来并不存在的意义,推理使之固化,并成为集合表量结构构式义的一部分。倘若这种语用推理模式得以重复的话,就会逐步规约化,造成重新分析,进而孳育了跨类交融的集合表量构式。

一般说来,交际者通过蕴涵和预设以及百科知识,填充或拓展集合表量构式的语义表征。我们以体现集合量词和临时量词跨类交融的“房”为例举隅说明。在“半潭秋水一房山”中,我们可推断出“房”不是称量山的整体量,而是侧显山在外貌上与房的相似,故而“房”充任的是个体量词。相反,在“一庄水竹数房书”中,根据交际双方的“互有认知环境”(mutual cognitive environment)(Sperber et al., 1995:41),听者可推断出“房”是计量书的集合量词,强调书的量之大,而非刻画书的形状。

此外,“房”还可充任临时量词:

(17) 渚莲香贮一房秋。秋叶上人头。(元·仇远《诉衷情·渚莲香贮一房秋》)(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就语用推理引发的语义演变来说,在伴随语境中,表量构式经常隐含意义。经过规约化,这一意义会成为表量构式整体意义的一部分。语言使用者可推知例(17)的“秋”与“房”的外形无相似之处,该句旨在彰显秋意之浓厚。倘若特定语用推理经常与集合表量构式共现的话,其认知表征就会得到加强。通过强化,这些新的表量意义逐步储存于认知主体的语义记忆之中,最终成为集合表量结构构式义的一部分。

罗纳德·兰盖克(Ronald Langacker)(1987:69)言之凿凿:“语言使用的一个常规特征是容忍(甚至是期待)很大一部分的非常规表达。”这种对非常规表达的认可对集合表量构式的跨类举足轻重,并充分展现了言者的意向性:“言者使用不同寻常的清晰表述,旨在吸引注意。”(Haspelmath, 1999:1057)这也从一个侧面昭示了语法化的宏观效果是如何导源于微观层面个体言语行为的。

需要申明的是,语用推理引发的变化还具有跨语言相似性。根植于语境的推理偏好不同文化中非常相似。譬如,在闽南方言中,集合量词的用法已经固化,主要计量人,如“一房人”。此外,临时量词的用法已经固化为个体量词,如“房”的一个意思是“套”,如一房傢俬(林宝卿, 2007:143)。

各种表量构式所勾画的事件是人们认知到的、在大脑神经组织留下痕迹的认知事件。

这些表量事件是人们认知能动性的心理体验,是从单一的神经组织放电到复杂的大规模结构性放电的认知发现(Langacker,1987:100)。这种认知发现一旦发生,就会留下某种神经化学痕迹,以利于再次发生。倘若再次发生,该痕迹就会被加强,经过反复发生而固化成为一种认知模式。集合表量结构在一定情境下的语用推理随历时演化浸润该表达的语义,成为构式意义的一部分。固化到一定程度,集合表量构式就会成为一个规约性的语法单元。

2.2 认知经济

美国语言学家齐普夫(G. K. Zipf)提出了省力定律(law of least effort),被认为是指导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Bussmann,1996:1303),被语言学家发展为经济动因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ic motivation)。譬如,埃文斯(Vyvyan Evans)(2019:273)直言认知经济原则是支配人大脑中范畴形成的一条基本原则。语言类型学坦承语言结构编码要受经济性动因和象似性动因的管辖(Croft,2003:101-102)。经济性和象似性是一对相反的力量,象似最大化和经济最大化的趋向是语言形式发展两大重要的竞争动因(Haiman,1985:18)。由经济性或象似性动因所决定的形式—意义映射关系在世界语言中普遍存在,不被任何一种动因支配的情况较为罕见,且从共时角度看也是不稳定的(Croft,2003:105)。凯勒(Rudi Keller)(1994:98)提出了一条交际准则:“以一种不会消耗多余力气的方式交谈。”语言经济性指用最经济的办法实现语言表达的最大效率。经济性动因要求一种形式对应多种语义,象似性动因则要求一种形式对应一种语义。集合表量构式跨类背后主要是聚合经济性(paradigmatic economy)在起作用。聚合经济性原则是指语言表达应尽可能简洁,运用一个语法结构去表达多重意义,从而实现心智表征的效率。

在跨类集合表量构式中,多个意义通过一个表量结构进行表达。举例来说,“片”既可是个体量词,表示“叶子”类事物的单位;也可是集合量词,计量连缀成片的事物,这是认知经济动因的体现。笔者认为,世界语言中可能存在象似动因占优势的情况,即“叶子”类事物用一个量词,而连缀成片的聚合物用另一个量词。这一点在藏缅语族的独龙语和景颇族载瓦语中得到了印证。孙宏开(1982:62-63)发现,独龙语“片”有个体量词和集合量词两个用法,如表 1 所示:

表 1 独龙语“片”的个体量词和集合量词用法

个体量词(片:薄片型物体的量)	集合量词(片:无生命事物的集体量)
kam çǝɿ ti laŋɣ 一片竹片	čmɣ ti duu/gǝɿ? 一片房子
竹片 一块	房子 一片

徐悉艰等(1984:66)洞察到,载瓦语里量词“片”有两个含义,如 2 所示:

表2 载瓦语量词“片”的意义

khjapʃ(片:薄的片状)	seʋ(片:面积小的片状物)
phoʔʃ lǎʋ khjapʃ一片叶子	ʃiʋ lǎʋ seʋ一片果子
叶子 一片	果子 一片

徐悉艰等(1984:60)把 khjapʃ 和 seʋ 视作形状量词,但未阐明这两个量词分工的原因。笔者认为, khjapʃ 是个体量词,而 seʋ 则是集合量词。独龙语和载瓦语表达“片”义的量词有两个,这背后是象似性动因在发挥作用。言者因循了说话者的行为准则(maxim of action):“以一种不被误解的方式交谈”(Keller,1994:90),冀图提高交际效率。

综上可见,现代汉语的集合量词遵循了认知经济原则,而藏缅语族的独龙语和载瓦语则依循了象似性原则。事实上,汉语许多方言中的量词也遵循认知经济原则,如湖南长沙话“片”能兼任集合量词,表示范围很大,如:坪里站哒一片人(许宝华等,1999:873),闽南语中的“片”同样是兼有个体(两片药)和集合(一片草地)两种用法(林宝卿,2007:415)。

事实上,不仅是“片”,其他集合量词也呈现认知经济性。在藏缅语族的白语中,“担”兼任集合量词和度量量词(徐琳等,1984:28-30);闽南语中的“担”既是市担的通称,亦是集合量词,用于成担的东西(林宝卿,2007:190)。饶有趣味的是,汉语量词“担”的用法与英语集合名词 load 同声相应。根据《剑桥高阶学习词典(第3版)》,“load”的意思是“(车辆等的)负载物”,如 a load of coal(一车煤)。现在集合表量构式“a load of N”表达的意思是“很多、大量”,如例(18)中的“a load of lizards”是“许多蜥蜴”:

(18) One day I was, um, outside when there was *a load of lizards* down the bottom of our garden. (*British National Corpus*)^①

如上一节所言,表量构式的样例包含了使用语境的信息及基于语境所得到的语用推理。这些暗含的推理义也是构式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言语交流的推理过程中,交际双方发挥各自的作用。劳伦斯·霍恩(Lawrence Horn,1984)把这些作用跟省力原则(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勾连起来。从言者角度衡量,省力原则要求言者尽可能少说;从听者的角度审视,这一原则要求言者尽可能多说。交际双方都意识到这两种要求之间存在某种张力,这种微妙平衡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交际者须从表量构式所蕴蓄的信息中抽取相关的集合表量信息。

中国近代思想家魏源《默觚》倡言“天下物无独必有对”,又云“有对之中,必有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天下事物包含着对立的方面,就此而言,集合表量结构和个体量词表量结构貌似对立,但仍不失为统一的表量范畴的构成成分。

2.3 视角调整

认知语义学认为“语言意义具有视角性”(Geeraerts,2021:24)。认知语法宣称视角是

① 网址: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bnc/>。

焦点调整的一个重要参数,标明言者对事态进行识解时所遴选的方法(Evans,2019:414)。语言表达式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传递交谈者对情境的视角(Langacker,1987:120)。人类的视角驱动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认知能力在视角化的浮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Pleyer et al.,2014:103)。

集合表量构式并非只是客观反映外部世界,而是塑造外部世界的一种手段,其核心功能之一是概念视角化。场景观察所取的视角对场景中事物的整体计量具有重要意义。客观事物的群体计量特征之所以能得到凸显,恰恰是因为认知主体对这一特征进行了视角聚焦。因此,要廓清跨类集合表量构式萌发的认知机制,还须解析句法结构演变发生时认知主体对情境的焦点调整。

集合表量构式是一种组织信息和选取视角的句法手段,对客观事物的整体计量受制于多元视角化(multiple perspectivization)。集合量词由非标准量词和集合量词向个体量词或动量词的跨越,背后隐匿的是认知视角的调整。譬如,说话者通过“把”字集合表量结构称量同类物体,将之群组化(grouping)为一个整体进行计量。这些物体被一手所握,体积小、数量多,不便确切计量,因此用“一把”作为对一握所得物体的集合或非标准计量。

细言之,集合量词“把”聚焦于事物的群体量,对于“蒿叶”“菊花”这些物体,用手“把”它们是“圈围”。换言之,认知主体的视角聚焦于手抓握而成的圈,计量时是依托这个圈去“拢”住表量对象的横截面,该横截面的周长是一握的面积。相反,对于“盐”“稻”这些事物,用手“把”它们是“包围”,认知主体的视角侧重于手围成的容器。之所以视之为包围,是因为一只手握起来的形状与半封闭的容器相仿,计量是把表量对象包在其中。

就个体量词“把”来说,如果说话者在搬运或使用一个物体时,常用一只手或两只手进行抓握的话,认知主体聚焦于自己的身体部位“手”,将其识解为物体的突出部分,用作称量单位。这里的视角化是基于相邻关系,借助于部分代部分的转喻。“把”具有了个体量词的属性,称量带柄的或易于被手抓住的问题。对于例(14c)中的“一把伤心泪”,“泪”被“把”包围,认知主体的视点在手圈成的半封闭的“容器”(萧国政,2004)。此时,认知主体将“一手之所握”隐喻为一个容器,计量时是把表量对象完全包在里面。

就动量词“把”而言,这一用法是认知主体利用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方式,遴选事件中最突出且共享的一面对动作加以计量。在说话者做出“抓”“扯”等动作时,往往会与受事的某一部位接触,并做出类似于抓握的动作。

简言之,认知主体依托非标准量词和集合量词聚焦于手所持握之整体量,凭恃个体量词着眼的是所持握物体整体的特定凸显部分,动量词聚光的是事件中最突出且共享的一面。

随着新颖的集合表量构式在语法中的确立,它与源构式的关联会逐渐消失。当各种各

样的表量结构均能实现集合表量时,这些结构依托聚合强化(paradigmatic strengthening),抽象为图式性的集合表量构式[数词+量词_{集合/个体/度量/临时}+X]。如此一来,当需要集合表量时,认知主体会自动唤起储存的表量图式构式,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基于语境重新诱发识解,予以应对,如例(19a)的表量对象“人”可如花般成“束”,例(19b)的“同情”可像稻谷般成“担”:

(19)a. 师云:“是汝诸人一时缚作一束,倒竖不净处。来晨相见,珍重!”(五代·静、筠《祖堂集》)(王绍新,2018:456)

b. 他到你那里来的时候,还每回带来一担同情!(鲁迅《而已集》)(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这种语境诱发的重新识解可视为视角化这一认知策略的产物。依据这一视角,表量构式的不同用法趋向于强调该构式的不同意义,这也是一个逐渐映射为转喻的扩展过程。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史墨提出“物生有两”(《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统一物包含有相互排斥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有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庄子有个著名的论断:“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恠橘怪,道通为一”(《齐物论》)。庄子哲学昭示的一个基本论旨是“齐万物”。北宋哲学家程颢认为万物皆与我同体,主张“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把客观消融于主观。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事物的差别都是相对的,是观察者本人所加给事物的。从“道”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窥见各类表量构式的差异有时是相对的。所谓的差异,无非是认知主体的视角相左。

3 跨类集合表量构式的哲学诱因

随着后现代哲学思潮的涌起,人文主义精神逐步回归生活、回到实践,以胡塞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都力推在社会实践和人际交往中对语言进行研究。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提出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坦言事态的感知和意义是由构成集体的个体共同构筑的。这是对主客观的分离和统一的哲学问题的一种回答。心智的共同性和共享性蕴藉着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这就是其主体间性。主体间性表明个体层次的认知要受集体层次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知识的辖制。

认知科学将人类的认知活动置于物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认识。人类的身体和认知与社会文化生活形态的存在方式之间产生相互作用,语言呈现出现今的特征,并展现了多样性(黄健平等,2025)。认知语言学的新经验主义基于进行思考的生命体的特质和经验来考察语义(Lakoff,1987),也就是以人的生物本能及在生存过程中获得的体验性、社会性、文化性经验为基础把握意义。奥尔加·费希尔(Olga Fischer)(2010:187)强调语

法形式系统是“文化上而非基因上的某种传递”。鉴于此,本节进一步从中国哲学视域寻索集合表量构式跨类交融的肇因。

从哲学维度审视,集合表量构式的跨类交融映显了汉民族的主体思维和辩证思维。

一方面,集合量词的跨类交融是中国哲学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思维的体现。中国哲学的三大主流(即儒释道三家),都睽重主体性,把主体视作宇宙中心。战国时期儒家代表孟子主张:“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意为万物皆由我而具备。南宋理学家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朱子语类》卷十七)。陆王心学也持天人合一观点。陆九渊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卷三十六)。陆氏把整个宇宙的理纳入了心中,声称实在只有一个世界,即“心”(宇宙的心)。王守仁直言:“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糟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

与此相仿,同时代的理学家魏了翁提出“人与天地一本也”(《论人心不能与天地相似者五》),认为“心”构成宇宙万物的最高本体。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强调:“惟其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张子正蒙注·太和》)。

综上可观,汉民族自古以来推重自我体验的反思,倾向于从主观经验出发来刻画事物。汉语表达偏爱把知、情、意糅合在一起,主观体验与客体描写水乳交融。如此一来,认知主体完全可以一“量”多用,如量词“片”可以勾画集合量和个体量,而“担”可以描摹集合量和标准量。不难看出,同一个量词能够在不同类型的表量构式之间流变,可谓“各‘量’皆备于我”。

另一方面,集合表量构式的跨类交融还是中国哲学辩证思维的映照。中国哲学历来根植于直觉体验思维和辩证思维。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道德经》第四十五章)。这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庄子直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意谓天人本来就是齐同的。西汉哲学家董仲舒力主天和人以类相合,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西晋哲学家郭象主张“同天人,齐万致”,强调天人万物均处于一种无是非界限、无彼我区别的冥然归一状态。唐代佛教禅宗希迁坦言“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参同契》)。

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主张“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二程遗书》),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其对立面,矛盾的双方各自向相反方向转化。北宋哲学家张载指出“一物两体,气也”(《正蒙·参两》),坦承世界万物皆是气变化的结果,气包含阴阳对立的双方,而这双方既对立又统一。事物如不内含对立矛盾,则一物不成其为一物。

天人合一说力图追索对立两方彼此之间莲藕同根的关系,这一关系既界限分明又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互相涉入、砥砺会通。中国哲学中的范畴之间缺乏泾渭分明的边界,在一

定条件下两个或多个范畴可以彼此渗透、相互交融,一个范畴的成员也能纳入另一范畴。从中国哲学辩证思维的视域检审,量词范畴的集合、个体、度量、临时等诸多成员相对独立又相互交融。

譬如,“房”在例(20a)和例(20b)中分别为临时量词和集合量词(意思是“一嘟噜”),两者交融:

(20)a. 假山半潭雾,空水一房星。(清·梁章钜、朱智《枢垣记略》)(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b. 太宗朝,远方咸贡珍异草木。今有马乳蒲萄,一房长二尺余,夫余国所献也。(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与此相仿,“把”在例(21a)、例(21b)和例(21c)中分别为个体量词、集合量词和动量词,实现了三重交融(郭先珍,2002:2-3;王绍新,2018:288-290;廖巧云等,2023):

(21)a. 然后把书院放了一把火烧了,明日寻出些残尸剩骨,假哭一番,依棺盛殓。(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b. 从兜囊之中掏出来纸人纸马,一撒手祭起在半悬空中,回手又撒了一把豆儿。(清·贪梦道人《康熙侠义传》)(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c. 邻居见他不信,劈手把鸡夺了掣在地下,一把拉了回来。(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由此可观,集合表量构式能同时与表量范畴的多个子类构式进行灵活的动态转换。质言之,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和融通思想是汉语集合表量构式跨类交融的另一根基。

4 结语

集合量范畴涵盖了一条持续路径上的多个节点,既可追踪过去特征,又可催生创新用法。集合表量构式的跨类交融是一种历时演变,但最终是一个共时的认知心理问题:集合量词的演变在说话人的大脑中发生,语用推理、认知经济及视角调整等认知动因孕育了跨类集合表量构式“数词+量词_{集合/个体/度量/临时等}+X”。此外,中国哲学的主体思维和辩证思维因素亦孳孕了集合量词的跨类交融。要言之,挖掘集合表量构式跨类融通的认知动因和哲学诱因将会深化对表量构式认知风格和哲学根基的洞察。

今后可以进一步参酌汉民族的思维模式(如历史思维、文化思维、逻辑思维),抑或是从跨语言的认知类型视域对跨类集合表量构式进行深入观照和细微体悟。这不仅有助于窥见跨类集合表量构式的本质异同,更有裨于系统探勘集合表量构式运作的深层机理,从而更好地蠡测语言表量系统的庐山真面目。

参考文献:

- Bussmann, H. 1996.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M]. London: Routledge.
- Bybee, J. 2010. *Language, Usage and Cogni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 2003. *Typology and Universal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V. 2019. *Cognitive Linguistics: A Complete Guide* (2nd Ed.)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Fischer, O. 2010. An Analogical Approach to Grammaticalization [G] // S. Katerina, E. Gehweiler & E. König. *Grammaticalization: Current Views and Issu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81-220.
- Geeraerts, D. 2021. Cognitive Semantics[G]// X. Wen & J. Taylor.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London: Routledge, 19-29.
- Haiman, J. 1985.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spelmath, M. 1999. Why Is Grammaticalization Irreversible? [J]. *Linguistics*(37): 1043-1068.
- Horn, L. 1984. Toward a New Taxonomy for Pragmatic Inference: Q-based and R-based Implicature [G] // D. Schiffrin. *Meaning, Form and Use in Context*. Washington, D. C.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1-42.
- Keller, R. 1994. *On Language Change: The Invisible Hand in Language*[M]. London: Routledge.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Vol. I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leyer, M. & S. Hartmann. 2014. A Matter of Perspective [G] // E. Cartmill, S. Roberts, H. Lyn & H. Cornish.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Confer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EVOLANG10)*.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98-105.
- Schmid, H. -J. 2020. *The Dynamics of the Linguistic System: Usage, Conventionalization, and Entrenchment*[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perber, D. & D. Wilson. 1995.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nd Ed.) [M]. Oxford: Blackwell.
- Traugott, E. 1989.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J]. *Language* (65): 31-55.
- 大堀寿夫. 2023. 认知语言学[M]. 潘钧,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冯赫. 2018. 汉语量词“合”与“合(盒)”的历时考察[J]. *汉语学报*(3): 81-86.
- 盖兴之. 1986. 基诺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高亚楠, 吴长安. 2014. 从显赫词类的扩张性看量词“趟”的语法化历程[J]. *古汉语研究*(2): 41-46.
- 高亚楠, 郑氏永幸. 2018. 汉语跨类量词的历史成因与哲学逻辑[J]. *汉语学报*(2): 14-20.
- 郭先珍. 2002. 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黄健平, 张昕晗, 赵春生. 2025. “连”字文化基因的体认语言学考察[J]. *外国语文*(1): 22-33.
- 蒋颖. 2009. 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比较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李计伟. 2017. 类型学视野下汉语名量词形成机制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李建平. 2016. 隋唐五代量词研究[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 李荣. 1996. 金华方言词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李小军. 2016. 汉语量词“个”的语义演化模式[J]. 语言科学(2): 150-164.
- 李鑫颖, 李勇忠. 2021. 体认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互动性视角下的英汉跨类表量结构对比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 40-47.
- 廖巧云, 李蕊秀. 2023. 体认视域下量词“把”的词义演变研究[J]. 外国语文(1): 20-30.
- 林宝卿. 2007. 普通话闽南方言常用词典[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刘世儒. 1965.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 龙耀宏. 2003. 侗语研究[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 孙宏开. 1982. 独龙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王绍新. 2018. 隋唐五代量词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魏兆惠, 华学诚. 2008. 量词“通”的历史发展[J]. 汉语学报(1): 19-26.
- 萧国政. 2004. 汉语量词“把”的意义, 分类及用法[J]. 江汉大学学报(1): 5-10.
- 徐琳, 赵衍荪. 1984. 白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徐悉艰, 徐桂珍. 1984. 景颇族语言简志(载瓦语)[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许宝华, 官田一郎.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一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The Cross-Type Collective Classifier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Its Cognitive Motivation and Philosophical Genesis

QIU Wei

Abstract: The dynamic nature of category remains a major concern for scholars, and the dynamic change of collective classifiers is the most essential manifestation of the dynamic feature in word class category. Cross-type collective 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however, enjoy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from previous studies. In Chinese there exists the cross-type collective classifier construction, which falls on four primary mingling types: collective-individual constructions, collective-measurement constructions, collective-temporary constructions and multiple mingling constructions. This study probes into its emerging roo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philosophy.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se types are motivated by pragmatic inference, cognitive economy and perspective adjustment. Furthermore, their emergence is built on the philosophical genesis of subjective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 in Chinese philosophy. This study could offer new insights in disclosing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Chinese measuring category and human cognition.

Key words: collective classifier construction; cross-type; motivation; cognition; philosophy

责任编辑: 蒋勇军